

新中国70年阅兵仪式的历史演进及其政治功能分析

马亮亮 张彦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新中国70年阅兵仪式大致经历了起步期、丰富期和拓展期3个阶段。时空、人一物和符号等元素作为政治仪式的主要“景观”在新中国历次阅兵仪式中得到突出呈现和更新发展,共筑着一个动态发展的阅兵仪式共同体。新中国历次阅兵仪式,内嵌着对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变迁的见证,具有激发政治情感、强化政治认同、维系政治秩序等政治功能。

[关键词]新中国70年 阅兵仪式 政治仪式 政治功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0)2-0124-05

从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到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举办了17次规模宏大的阅兵仪式。新中国70年历次阅兵仪式集中反映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识。同时,每一次阅兵仪式又都是一次思想政治教育,极大地增强了民众的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因此,对新中国70年不同阶段阅兵仪式的“景观”设置变迁和政治功能表现进行考察分析,既有利于全面理解和把握新中国各阶段特别是新时代阅兵仪式的结构、特点和意义,也有利于更好地阐释和发挥阅兵仪式在意识形态传播、权力关系展演和国家认同建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新中国70年阅兵仪式的历史分期

早在公元前,阅兵就在一些文明起源较早的国家进行,其中包括埃及、波斯、罗马、中国等。我国最早期的阅兵可追溯到夏朝,春秋战国以后,我国古代阅兵仪式渐趋成熟。一般认为,我国现代阅兵仪式始于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被视为我国现代阅

兵仪式的蓝本。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共举办了17次盛大的阅兵仪式,分别是1949—1959年期间的11次国庆阅兵,1984年、1999年和2009年3次国庆阅兵,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2017年7月30日建军90周年朱日和阅兵,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根据我国社会发展史的分期、政治社会变迁的基本线条以及阅兵仪式的变化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7次阅兵仪式可以划分为起步期、丰富期和拓展期3个阶段。

首先,前11次阅兵仪式分属于新中国阅兵仪式的起步期。这一阶段的阅兵处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复杂环境,高频度成为这一阶段阅兵最显著的特征。将这一阶段称为新中国阅兵仪式的起步期,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从时间序列上来看,这11次阅兵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进行的阅兵。一方面,阅兵仪式的各项安排和各个环节没有定型,尚处探索阶段;另一方面,以倒叙的方式进行审视,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在展示的装备、传播的手段等与改革开放后的阅兵仪式相比有较大差异,表现出刚起步的特征。以传播的手段为例,这一阶段阅兵仪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发展理念的价值排序与中国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8AKS010)、2018年度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科研支持计划重点项目“学校仪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项目编号:myjs20182)阶段成果

式的传播主要借助印刷媒介进行报道,普通民众更多地是通过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对阅兵仪式进行非即时性的信息获取,而改革开放以后,民众则渐次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移动互联网等方式对阅兵仪式进行全程了解,逐渐突破时空限制,达到视听觉一体的体验效果。二是从规制延续上来看,这一阶段阅兵仪式所形成的程序和内容为之后的阅兵提供了诸多参考,奠定了其先行、起步的地位。比如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流程“升国旗,鸣礼炮——阅兵总指挥向检阅首长报告,检阅式开始——检阅首长向解放军指战员发布命令——分列式开始——结束”得到传承和延续,之后阅兵仪式唯一的变化仅是“检阅首长向解放军指战员发布命令”被“检阅首长发表重要讲话”所替代。

其次,1984年、1999年和2009年3次国庆阅兵分属于新中国阅兵仪式的丰富期。这一阶段的阅兵处于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这一阶段的阅兵目的在于集中展现改革开放的成就,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激发民众爱国情怀。1984年阅兵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首次阅兵,展现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建设成就和新气象;1999年阅兵展现了国家改革开放20年在各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进入21世纪的自信和从容;2009年阅兵是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后的政治社会背景下举行的,充分展示了我国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之所以将这一阶段称为新中国阅兵仪式的丰富期,主要是因为从受阅部队、展示装备、传播手段、表现主题、象征意义等维度来看,这一阶段的3次阅兵仪式都与前一阶段的阅兵仪式有了极大的丰富和提升。虽然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前后跨度时间长,至少以10年为1个周期,但是阅兵仪式的规模更加宏大、场面更加壮观。同时,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已不再是一般性的军队演习和军事能力展示,而更多地是展现具有全民意义的举国庆典。

最后,2015年的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2017年的建军90周年阅兵和2019年的国庆70周年阅兵分属于新中国阅兵仪式的拓展期。这一阶段

的阅兵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过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和改革开放长期努力,“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10]。新时代的3次阅兵与以往14次阅兵有着显著不同,它们拓展了新中国阅兵仪式举行的时空、表现的主题和设计的内容,创造了多个首次,体现了新时代的新特点。

一是阅兵仪式在时空上的突破。在举行时间上,这一阶段阅兵不再局限于国庆日。2015年阅兵的举行时间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17年阅兵是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是在建军节前夕举行。在举行地点上,朱日和训练基地成为天安门广场之外新中国阅兵仪式的又一场所。二是阅兵仪式表现主题的拓展。一直以来,新中国阅兵都是作为国庆庆祝活动的基本仪式,其核心主题是为新中国庆生。新中国阅兵主题在新时代阅兵中得到了拓展。其中2015年阅兵是我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为主题进行的阅兵,彰显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主旨,2017年阅兵是我国首次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为主题组织的阅兵仪式,沙场点兵的形式体现了“实战化”的色彩。三是阅兵仪式设计内容的创新。新时代3次阅兵在仪式内容的设计上有着诸多创新亮点。2015年阅兵特别邀请了外国军队参阅、邀请外国领导人出席观摩阅兵仪式,体现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国际性以及中国愿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信心。2015年阅兵中的抗日老兵方队和英模方队,2019年阅兵中的战旗方队,这些历史元素的体现增强了阅兵活动的历史纵深感、厚重感,凸显了人民军队“赓续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理想”的鲜明特色。2017年阅兵和2019年阅兵中仪仗方队同时高擎党旗、国旗、军旗接受检阅,2019年阅兵还特别增设了检阅首长向党旗、国旗、军旗行注目礼的环节,体现了仪式的庄重与威严。

二、新中国70年阅兵仪式“景观”设置的变迁

西方有学者将仪式分为通过仪式、纪念仪

式、交往仪式、痛苦仪式、节日仪式和政治仪式等6种。^{[2]94}在这6种仪式中,政治仪式是一项表达政治情感、传递政治讯息的仪式活动,它由时空、人一物、符号等诸多要素组成。这些不同的要素在政治仪式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和意义,并通过一定的程序得以表现和发挥。以政治仪式的理论视角观之,新中国70年阅兵仪式中的时空、人一物和符号等“景观”设置蕴含着特定的政治寓意和象征意义,并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的发展“上演一部政治戏剧”。

首先,在时空上,任何一个仪式的举行都处于特定时空的配置中。就时间方面,除了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和建军90周年朱日和阅兵,新中国70年历次阅兵仪式都是在10月1日国庆节举行。同时,2015年和2017年两次阅兵仪式的举行时间,也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记忆,传递出特定的政治目的。选取固定或特定的时间举行阅兵仪式,能够进一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增强民众的凝聚力。新中国70年阅兵仪式在时间上除了表现出相对固定和稳定的共同特征外,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同阶段阅兵仪式举行的频率不同。第一阶段我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处境,需要通过高频率阅兵仪式来震慑国内外敌人,增强民众对新生政权的拥护和认同。第二阶段我国国内外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举行阅兵仪式主要是为了展现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阅兵仪式也逐渐成为民众观赏视觉展演、分享精神意义的重要活动。第三阶段多次举行阅兵仪式主要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有关。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保持适当频率的阅兵仪式对内能够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激发民众团结进取的斗志和信心,对外可以展现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震慑敌对势力。

就空间方面,新中国70年来的17次阅兵除了2017年阅兵地点在朱日和军事基地举行外,其余均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选择天安门广场作为阅兵仪式的场所与天安门广场的政治和历史因素有关。天安门广场坐落在国家首都的中轴线上,从建成至今,一直都是国家权力核心的象征。同时,数百年来,天安门广场的空间形态也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皇权到民权的演变过程。正是因为其在

新中国成立后所承载的权威性与人民性,天安门广场成为人民接受国家政治洗礼和感受国家主人翁地位的最佳仪式场所。

其次,在人—物上,仪式活动的主体是人,而物一般在仪式活动中承担着展示和象征的作用。就人员方面,检阅首长和受阅官兵在多样的人员构成中占据主体地位,两者间的互动既体现了权力关系,也象征着政权的稳固。同时,检阅首长和受阅官兵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是检阅首长的角色在第二阶段发生了更迭。在第一阶段阅兵仪式中,检阅首长由朱德、彭德怀等以三军总司令或国防部长的身份担任,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整个阅兵仪式,并举手敬礼。第二阶段开始,检阅首长由中央军委主席出任,这也成为后续阅兵仪式的惯例。二是受阅官兵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兵种和方队上的变化。在兵种上,新型兵种不断涌现。如1984年阅兵首次出现空降兵,2009年阅兵首次出现特种兵,2019年阅兵首次出现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等,兵种逐渐趋向现代化、机械化和信息化。在方队上,各阶段考虑政治环境或阅兵主题的因素有着相应的安排。如第一阶段公安部队组成方队接受检阅是稳定国内局势的需要;第二阶段女兵方队开始出现在受检阅方阵中体现了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第三阶段维和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向世界传递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

就器物方面,新中国70年阅兵仪式中的器物除了国旗、领导人画像和标志性建筑等外,最具象征意义和最为引人关注的器物分别是服装和武器装备。服装上,除2017年阅兵外,检阅首长多是身穿中山装对受阅官兵进行检阅,这一中国文化元素传递出中国力量、承载着中国梦想。2017年阅兵习近平身穿迷彩服检阅部队,则体现了检阅野战化、实战化。阅兵仪式中受阅官兵身着新式军服亮相,展现了焕然一新的军容军貌,从根本上反映了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成就。武器装备上,新中国70年阅兵仪式中的参阅武器装备经历了从缴获的“万国牌”到实现全部国产,从装备技术落后到赶上甚至引领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展现了我国国防军队建设70年自力更生、拼搏奋进的跨越式发展之路。

最后,在符号上,政治仪式由一个个象征符号

构成,“这些符号能够在政治仪式中留下隐匿的痕迹,以其强烈的隐喻和暗指能力在政治仪式的操演过程中担负起输送和转移特殊政治信息的重任”^[9]。阅兵仪式借助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符号传达特定政治寓意。仪式符号可以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阅兵仪式中的语言符号包括口语和文字两种,主要涉及标语、口号和讲话。通过语言符号,政党或政府能够掌握解释仪式意义的主动权,在此基础上实现宣扬政治主张、塑造政治权威的目的。第一阶段阅兵仪式的语言符号主要表现为以“万岁”为后缀的各类型标语或口号,如“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第二和第三阶段的阅兵仪式虽有沿用“万岁”口号,但更多地是使用“好”字,比如“小平,您好”“同志们好”“首长好”“主席好”等。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阅兵仪式中的非语言符号包括声音、图像和数字。声音符号主要体现在鸣礼炮声响和军乐团奏乐,图像符号主要有国旗和领导人画像,数字符号主要指鸣礼炮的响数。新中国70年阅兵仪式大都有鸣礼炮和军乐团演奏,变化的主要是鸣礼炮的响数和演奏的曲目。在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仪式中,鸣放礼炮28响,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28年的奋斗史。从1999年国庆50周年阅兵仪式开始,鸣放礼炮的响数发生了变化,与当年的纪念日联系在了一起,如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因此国庆阅兵仪式中56门礼炮鸣放炮声70响,寓意56个民族70载春华秋实的拼搏和奋进。同时,新中国70年历次阅兵仪式也有保持稳定不变的符号,例如国旗、毛主席和孙中山的画像等。作为阅兵仪式中的核心符号,它们建构了国家的基底,表达了民众的共识,是政权的象征和标志,是政治记忆得以生产、政治权力得以维系的保障。

三、新中国70年阅兵仪式的政治功能及其发挥

仪式是一个涵盖表演、象征、文化等多维度的复杂综合体,因而,仪式的功能也是多样化的。学者们对仪式功能的分析集中在情感、信仰、秩序等方面。就情感方面,涂尔干用“集体欢腾”一词来描

述仪式带给人们的情感体验:“如果有氏族或者是部落的一部分受到召请参加集会,这时候,这种集中就发生了,他们将举行宗教仪典,或者通常按照民族学的说法,叫做‘集体欢腾’(corrobbori)。”^{[4]285}情感功能是仪式对于个体浅层意识的作用,再往深层次,仪式的情感功能就上升为信仰功能。有学者认为仪式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能够形成一种共识性的认知、产生一种供认可的精神。美国学者凯瑞提出“传播仪式观”的概念,指出仪式的传播不仅指一种分享和传递信息的行为,而是一种“共享信仰的表征(representation)”^{[5]7}。对于组织的作用而言,人类学中结构——功能范式的学者如布朗、特纳等认为仪式具有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团结的功能。阅兵仪式的功能与仪式相比,往往体现出较浓的政治色彩和特性。新中国70年历次阅兵仪式发挥着激发政治情感、强化政治认同、维系政治秩序等政治功能。

首先,激发政治情感。有学者指出:“统治者数千年来(实际上是自从有统治者以来)一直努力通过设计和使用仪式,激发民众的情感以支持他们的权威,唤起大众的热情以支持他们的政策。”^{[6]18}阅兵仪式通过自身的神圣感和庄严感,对民众在情感上产生重要的影响,使民众感受到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共享的情感体验被更新,民众对政党、国家、领袖的热爱之情以及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被唤醒。3个阶段阅兵仪式所激发的政治情感也有所侧重。新中国刚成立,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高频度的阅兵仪式激发了士兵和民众保家卫国的集体心理,坚定了民众捍卫新生政权的信心,增强了民众的安全感。同时,在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上,通过集体高喊“万岁”等口号,民众对党、国家和领袖的热爱与忠诚之情被激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家发展步入正轨,在这一阶段,至少10年一次的阅兵仪式成为民众狂欢的节日,民众从阅兵仪式中感受着改革开放后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爱国情怀日益高涨,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逐步增强。由此,民众对改革开放的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被激发。进入新时代,国家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民族复兴步伐势不可挡,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军容军貌

威严、武器装备先进、群众面貌自信、国际社会瞩目,展现了大国的风采和一流军队的风貌,激发了民众对国家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强烈自豪感,表达出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团结奋斗的豪迈气概。

其次,强化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指的是民众对政党、政权的拥护和支持以及对国家表现出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阅兵仪式通过使用众多有视觉冲击和情感共鸣的象征符号,特别是体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元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成果等,构建民众对政党、政权和国家认同的框架。不同阶段的阅兵仪式在强化士兵和民众政治认同的方式上表现出较强的时代特点。第一阶段,在国内政治问题延续和冷战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国内外环境复杂严峻,因此阅兵仪式针对现实情况,客观上营造了一个“他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阅兵仪式中,这个“他者”更多指向的是“敌人”,政党和国家通过利用“一致的敌人”来感召、动员、团结民众,强化他们对国家的认同。第二阶段,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交流、交往的扩大,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他者”的含义偏向“他国”,“敌人”的含义被有意淡化。同时,阅兵仪式上领导人反复向民众强调“我们”这一复数人称代词,促使民众定位自己国家主人翁的身份,从而增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同。第三阶段,我国国内外环境与第二阶段又发生了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周边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因此,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除了像第一阶段那样强调“他者”“敌人”来凝聚民众和士兵的认同外,还通过唤起民族深层的共同历史认知、激活人们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构建起民众的集体记忆,从而强化他们对政党、国家、民族的高度认同感。

最后,维系政治秩序。政治秩序需要靠权威来维持,而阅兵仪式则为实施这一活动的主体——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权威保障。阅兵仪式通过选用特定的标语、口号、音乐以及展示尖端的武器装备和标志性的发展成果来展现一个政权维护自身统治的底气和意志,加强对民众的强大感召,从而构筑起稳定的国家环境和政治秩序。不同阶段阅

兵仪式所维系政治秩序的主要内容和方式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第一阶段,新生政权面临着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的危险,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主要通过广泛动员民众、构建良好的“领袖——群众关系”来凝聚民众的情感和力量,从而起到维护新生政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顺利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争取良好国内外环境的目的。第二阶段,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国内外环境虽然发生了很大改善,但形势依然比较严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力量遭受重大挫折,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主要通过展示突出的发展成就、重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来明确执政党的权威和国家政权的稳固,从而引导民众支持改革开放,增强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第三阶段,中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并存,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除了综合使用前两个阶段的方式,还通过整合的历史观和强大感召力的民族梦想,体现人民政权合法性的历史逻辑,展现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全新的发展面貌和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引导民众坚定“四个自信”,从而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铸就伟大梦想的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Catherine Bell. Ritual: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 [M].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 王海洲.试析政治仪式中的声音符号及其象征意义[J].天津社会科学,2011,(2).
- [4] [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5] [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 [6] [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M].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顾良艳]